

千古凭谁定是非



王学泰杂文自选集

王学泰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千古凭谁定是非

王学泰杂文自选集

王学泰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古凭谁定是非:王学泰杂文自选集/王学泰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55-0999-0

I. ①千… II. ①王…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6054号

千古凭谁定是非

作 者 王学泰
主 编 朱铁志
出 版 人 王吉胜
责任编辑 柯 湘
文字编辑 彭洪清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999-0
定 价 49.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编编码 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577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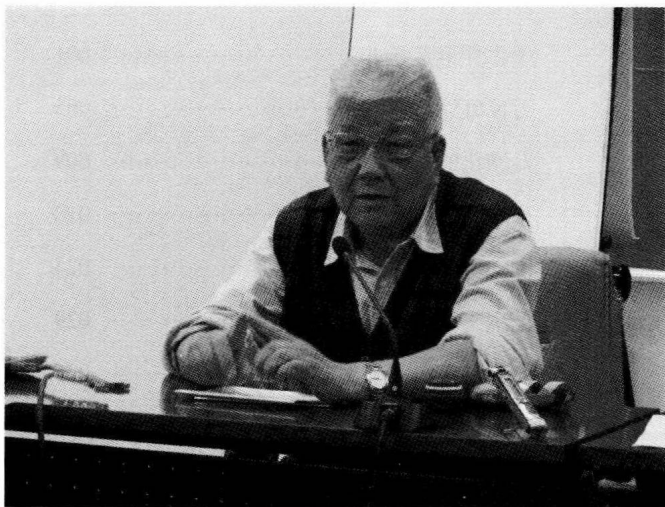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1942年底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2003年退休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后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比较关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著有《中国饮食文化史》《幽默中的人事百态》《水浒·江湖——理解中国社会另一条线索》《中国人的幽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等，并有多种结集出版的随笔集，如《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重读江湖》《发现另一个中国》《平人闲话》《王学泰读史》《采菊东篱下》《坎坷半生惟嗜书》《水浒识小录》《一蓑烟雨任平生》《监狱琐记》等。

王学泰

一
评史

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

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前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入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

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已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

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序言

王学泰

去年，出了一套自选集，名曰《王学泰自选集》设计是五本，出了四本，其中所选绝大多数是退休以后的随笔、杂文、散文等。老了写作能力有限，这十年所写零散的文章在这四本书中已经囊括大半。年初，铁志兄又邀我加入他为金城出版社编纂的一套杂文——《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很感谢铁志的热情和信任，确实又有些为难：“这些年，除了一些专著外，就写了百十来万零碎文字，如果选来选去，出版各种选本，读者不知，买重了以后，大呼上当，要挨骂的。”铁志解释说：这套书是继他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之后而编的。原本就在计划之中，因各种原因拖至今日才实施。

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时，铁志计划为入选的作者再各编一本个人选集，用以“全面展示新时期杂文创作的基本情况，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可资信任和检索的翔实资料”。以期读者对于新时期以来中国杂文的进展有个较为详细的了解。这套书与我个人的“自选集”读者群不同，他劝我在序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读者是会理解的。主编

的盛情使我难以回拒，于是有此集之编。这是第一个要向读者说明的。如果您买重了，套句老话“勿谓言之不预也”。

其次就该说为什么要取个“定是非”的名字了。第一为了省事，由于本集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千古凭谁定是非”。为什么那篇文章以此为题目呢？因为该文是评论清官戏的，所以就便改林则徐赠邓廷桢诗中的名句“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而为题。第二，因为个人修养没有达到古之圣贤的“口不臧否人物”、不论人间是非的地步，因此为文就不免说些是是非非。

当然古人不都是不论是非的。比如儒家就很重是非。孔子为什么痛骂“乡愿，德之贼也”，其原因就在于面似忠厚的“乡愿”，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所以孔老夫子骂他们是败坏道德的元凶；孟子甚至认为每个人都有是非之心，它是人性的一部分。即“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把它看做“智”的发端，如果“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这种批评是很严厉的。孔子孟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一方面是战乱频繁，社会

动荡，朝秦暮楚；一方面是社会开放，民智渐开，思想活跃。后者使人们关注现实，勇于评断是非；前者使人畏惧是非，怕成为是非争议中的牺牲品。庄子看惯了朝三暮四，就觉得哪有什么真是真非，无非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罢了。古代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是非取向大体也就是这两种。古人认为这两种实际上是在朝在野、兼济独善之分，今人总结为是古代知识人的“儒道互补”。

那么老百姓呢？鲁迅曾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现代人一说到是非这个大题目便习惯性地将人们分类排队，到最后就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发展下去正是《庄子》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了。

世间究竟有没有认识较为一致的公是公非？不著名的清代文人郑兼才（台湾文化奠基者之一）曾说：“有闻见，即有是非；有是非，即有好恶。其存于人心者，虽愚夫、愚妇不可掩；其著于公论者，虽天下、后世不能欺也。然则记私也，即不以为公可乎！”这段话出自《台湾守城私记序》。嘉庆九年（1804）郑兼才被派到台湾（当时台湾的编制仅是个县）做学官，一到台湾就遇到洋贼蔡牵从海上犯台湾，岛上也有动乱。郑兼才参与了守城与平乱。经过了 this 重大事件之后，官方自然对这些既有记载，也有评价，所谓“官有文告、达朝有封章”，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似乎应该画个句号了。可是，郑兼才意犹未尽，又根据自己所闻见的“军民之情状、攻守之大势以及功罪、虚实、爵赏当否，举文告、封章所可言与不可言、所及言与不及言者，而皆以私记之”。也就是在正

式记载和评价之外，郑兼才又写出一份自己的“私记”，并借以表达自己的私见。不知他是否把这份“私记”上交给官方，留作备案。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对于重大事件的责任心。

在《台湾守城私记序》中郑兼才肯定了私记私见存在的必要，认为一个事件正是因为有了许多私记和各种私见的充分表达才会形成公论，有了公论才能凸现公是公非，或者说公是公非正是许多私见累积和互相补充的结果。从这些见解可见郑兼才这位嘉庆年间福建乡试的“解元”（举人考试第一名），头脑并不冬烘，作为朝廷的一个官员竟敢在“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传统氛围下，竟敢提出“私记”，颇有点现代意识。

传统文化中往往没有“私”、或者说没有个人的位置，这一点在法家代表人物中说得尤为坦露。“评法批儒”运动中被捧上天的韩非子强调人臣“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不仅不能私自胡言乱语，连用眼睛自由看一看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人臣只能“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法家不仅剥夺了人臣的一切，甚至不许“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举国之中只有一架思维机器，就是皇帝的大脑。秦始皇非常欣赏韩非子的“学说”，可以说是韩非的知音。他以韩非子之道治国，黎民百姓都没有了是非，天下安静了许多，就由着皇帝一人折腾。始皇帝折腾了十多年，本想传之千世万世，没想到“二世而亡”。“道义无今古，人间有是非”，看来还是至理名言。

传统文体中的“杂文”本来指很难归类的杂体之文，到了鲁迅手中杂文就变成了专门议论是非的特殊文体。在这种文体中，鲁迅上天下地，

古今中外，无所不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当然表达的都是他个人的独特的私见。虽然鲁迅的个人见解并非百分之百的正确，但他所有的议论都为累积公是公非、为探索真理做出了贡献。至今，我们仍然引用他的名言隽语、接受他的许多论断，甚至被视为公论。

本书作为杂文选本，因此其命名，就不单纯为了“省事”，而且与体例相关。

是为序。

2015年1月15日